

中国农村问题新论

刘同钧 陈士善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编 前程似锦

后起“灿星”的成功之路·····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	(10)

第二编 成功奥秘

村办企业发展的诀窍·····	(33)
乡镇企业的现状与展望·····	(48)
私营企业成功的奥秘与忧虑·····	(69)

第三编 科技兴农

农业综合开发前景广阔·····	(80)
农业要发展 科技是关键·····	(90)
发展高效农业 振兴农村经济·····	(102)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发展农业·····	(115)

第四编 双层经营

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126)
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成功尝试·····	(142)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152)

第五编 改革新曲

乡镇“小政府大服务”的改革方向·····	(169)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由来和发展·····	(178)
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196)
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亟待整顿·····	(211)
加强农税干部队伍建设·····	(223)

第六编 基层建设

新时期农村党建工作的新课题·····	(231)
增强班子合力 发挥群体功能·····	(244)
村民委员会的演变和建设·····	(258)

第七编 思想教育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全面实现小康目标·····	(274)
转变农民思想观念 加快奔小康步伐·····	(287)
农村宗教问题面面观·····	(296)
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现状与对策·····	(317)

第一编 前程似锦

后起“灿星”的成功之路

当妩媚的春天把手中的彩笔迎送给前来“接任”的夏天，天地间倏然变得色彩愈加浓重了。

位于黄海岸边的牟平县解家庄镇的东泊子村，那天似乎愈加湛蓝高阔，那海仿佛喉结愈加雄浑粗犷，而那山、那地，绿荫苍苍翠翠，鲜花红红彤彤，显得分外妖娆壮丽。

这个拥有800多户人家、3640亩耕地的东泊子村，在牟平大地上算得上屈指可数的大村了。它是个大村，可也是个以“穷当当、乱糟糟”闻名远近的村庄。公元1985年前，村里外欠债款高达26万元，20几号干部年复一年泥里水里忙活，却拿不上一分钱的工资，集体存折上始终划着个大0蛋！村子越穷，人心越散，风气越糟，打仗斗殴、偷鸡摸狗、超生超育屡禁不止；更令干部头疼的是：集体领导威风扫地，说话没人听，管事遭白眼，要粮、要款比登天还难。

东泊子村，曾一度被人戏称为“被富裕、文明遗忘的角落”。

屈辱，滔染着迭涌的浪花，发出声声揪人心肺的呜咽；沉痛，折弯了苍松的枝丫，垂下伤痕斑驳的头颅！

人们翘首渴盼，何时东泊子村也会象那浩瀚灿烂的银河系里的一颗星辰，闪射出自己的光华？

岁月匆匆，弹指7年工夫，东泊子村居然以巨人般的步伐，大踏步地跃入全镇的先进行列，以全新的姿容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连续4年被县、镇评为文明村庄和模范党支部；1991年集体工副业纯收入达到500万元，比1985年翻了6番多；固定资产达到1580万元，比1985年增加了6倍；人均分配达到1400元，比1985年增加800多元。

现今，在胶东半岛已经星罗棋布的超亿元、千万元村的银河系里，后起的东泊子村，端地是升起的又一颗光彩夺目的灿星！

转折中的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农村改革，使我国农村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在驱贫追富的战鼓声中，中国农民冲破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所设置的一道道栅栏，走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朝阳大道。东泊子村无疑也被卷进了这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大潮之中。

实践一再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于克服旧体制中的弊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尽管它还存在着许多需要充实和完善之处。

真不该刺痛那段沉痛的记忆！东泊子村在这场伟大的转折中，却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尤其在一度出现的“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个体不如私人”的纷乱舆论氛围中，

误入了“分光卖净”、“砸锅分铁”的歧途，似乎搞生产责任制就是讲的一个“分”字，分得越光、越干净、越彻底、越具体，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全然忘却了集体经济和承包者之间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的相辅相成关系。

正如哲人所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正是在这种偏见的支配下，东泊子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夜间将原有的10个生产队、1个渔业队、3个工副业项目等合作化以来积蓄的全部“家当”，廉价拍卖殆净。同时，还拍卖了大小14辆车、5台拖拉机、7台脱谷机和50多间房屋，就连养猪的猪圈也无一幸免，集体家业只剩下几栋固定资产净值不足30万元的空房子。

手里没米，唤鸡不来。“分光卖净”的所谓责任制，一下子使东泊子村陷入危难之秋。最明显的是干部的“指挥棒”失灵了，说话办事要看人家的脸儿；叫行承包的经营者，小生产观念甚浓，私欲膨胀，使尽掠夺性生产手段，结果厂房、设备该修不修，破损严重，承包磨房者，仅一年时间，就把机器设备搞得稀里哗啦，最后跟干部撒了泼，甩手不干了。到年底，承包者没有一人完成利润。集体家底一经削弱，为农户服务便成了一句空话，使家庭经营碰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经商热流的冲击下，一些人赚钱眼红，弃农经商者有之，行骗勒索、偷摸盗窃者有之，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干部则变成要粮、要钱的角色，干群关系也由过去的鱼水关系，日渐变为“油水”、甚至“水火”关系了。

在中国农村实行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数以万计的农村迎着党中央发令枪的响声弹跳了出去，最迅速地掌握了党的政

策，从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最迅速地更新了陈旧观念，给古老硬化的血管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挣脱了束缚自己的绳索，冲上了农工商一体化的共同致富的跑道。然而，东泊子村却一着不慎，在失误中一蹶不振。

东泊子人在苦痛中沉思，寻觅……

危难中的崛起

对于一个开拓者来说，失误和苦难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1985年金秋十月，32岁的孙成山在镇党委的再三说服下，卸下村委会主任的挑子，走马出任党支部书记，他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扶耒撒种无所不精，而今要扛起这历史赋予的重任，他着实犹豫了，徬徨了。他赞成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可以把农民从形式上的主人变为真正的主人，极大地焕发农民劳苦耕作的热情，但是他反对将已经积蓄起来的集体财产拆散殆尽，正如一架完整的机器，一经卸掉其零部件，就失去了机器存在的实际意义和实用价值，农村要致富，必须靠有坚实巩固的集体经济，这是被许多冒富村庄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发展农村经济，只讲分不论统，是放弃领导；只有统分结合，才是发展经济的正路。

孙成山从痛苦的沉思中，终于拾得了一串思悟的珍珠，在他召开的第一次支委会上，他说：时代已经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不允许我们再当“糊涂官”了，也不允许我们再等下去了，眼前的挫折和教训告诉我们，分散单一的经营富不了老百姓，也富不了东泊子村。要想全村都富起来，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经济，致力于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大河涨水小河

满，锅里有饭碗不空，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最普通的道理。

在统筹权衡了东泊子村的实际状况后，党支部果断决策，奏鸣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三部曲”：

首先，立足资源优势起步。这年秋末，孙成山雇用一辆“三轮兔子车”，东奔牟平、威海，西跑烟台，受尽颠簸之苦，可希望的太阳依旧深深地埋在地平线下。他没有泄劲，1986年春节刚过，又驱动“三轮”，潜进爆竹烟花气味尚未消散的烟台。他坚信，只要舍得气力，一定能从汪洋大海中捞出一针一钉。一天，他偶然捕捉到烟台建港需要细沙的信息，心中不禁翻起一阵喜悦的浪花：村北沙场广阔，何乐不为？当他打通关节，立即与烟台海运公司协作成立了海上运输队，并由他挂帅组成20几个青年参加的突击队，舞楫驶船，朝迎彩霞，晚驮星光，直把个宁静的海湾搅得沙扬浪腾，笑语喧天。这一年，男子汉们用迸溅的汗水收获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3万元！

东泊子村第一次洗净了苦难追逐的耻辱，铸造出第一座物质文明的丰碑！

至此，孙成山和他的伙伴们，象鼓满风帆的扁舟，撼动手中的橹桨，一路风疾地跻进了商品经济的沧海。

1987年初春，东泊子村又把战场拉到了沉睡了千年的荒海滩。他们要让这无垠滩涂唱出一曲鱼跃虾欢的青春之歌。就在这一年，他们投资10万元试养的20亩对虾，竟然以亩产350斤，打破烟台市的单产养虾记录！1988年，他们再接再厉，又相继办起两个海水养殖场，养扇贝60亩，贻贝240亩，年收入达40万元。大胆地尝试和可喜的收获，极大地开阔了全村干部群众的视野，振奋了干部群众的精神。1989年，他

们又筹资73万元，开发了450亩虾场。几度春秋，如今那550多亩摩肩擦膀的养虾场和1000多亩海面养殖的扇贝、贻贝和海带，每年都以百万多元的收益，壮大着东泊子村日益膨胀的集体腰包。

其次，着眼市场求发展。在开发海上养殖的同时，孙成山和他的“一班人”把触角伸到工业生产的领域，在发展工副业上寻求集体致富的门路。他们牢牢掌握“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量力而为”的原则，在决策上项目之前，进行深入细致的可行性论证，严格考察“原材料是否有来源，技术是否有保障，产品是否有销路”，不上竞争对手多、相互“分材料、争技术、争市场”的项目，杜绝了盲目乱上的事情发生。1988年，他们准备上一个染料厂，除兵分几路，到同行业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外，孙成山还亲自到北京、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考察，最后又从烟台等地请来几位专家、学者，召开论证会，从技术、经济、市场等角度，进行了全面论证。在此基础上果断决策，投资35万元上马建厂，投产第二年就实现利润60多万元。

这以后，他们以每年投资近百万、每年兴办两三个工业新项目的速度，先后办起聚氨酯保温材料、防腐保温、轻机制造、化工、商场等21个企业单位。一座容量为200吨、投资300万元的冷藏加工厂，正呼啸崛起。

大工业文明的巨轮，正以它独特的风韵魅力，一路放歌驶进了东泊子村这片陆海相依的秀美土地。

再是，发挥集体经营的优势。为了把昔年被拆散的集体经营的工副业项目重新恢复起来，孙成山走家串户，袒露一颗共同富裕的赤诚心肺，先后将拍卖给个体的造锁设备厂等企

业回归集体经营。至此，拆散零碎的齿轮、螺钉，重新组装在集体经济的大轴上，集体经济焕发了勃勃生机。

今天的东泊子村，已形成农业、工业、商贸、养殖四大公司，固定资产由原有的60万元猛增到1560万元。公共积累已达1670万元，人均收入实现1400元。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村子也随之更换了一个闪烁着时代色彩的名字：东泊子村实业联合总公司。

奋进中的探索

集体富有的甘泉，灌绿了东泊子村的山川碧海，也灌醉了东泊子人的心田。为确保集体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孙成山和他的“一班人”在实践中，着力强化了“三招”：

第一招，成立东泊子村实业联合总公司，并建立健全了以经济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强化宏观指导。党支部书记孙成山兼任总公司董事长、经管会主任，并对全村经济工作负全责。这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管理体制，经管会负责领导各企业的经营工作，对企业实行统一管理。全村20个工副业单位和法人代表，全部由经管会主任孙成山担任。企业的合同签订，财政大权全部由经管会负责，经管会统一调配资金，严格控制各厂资金的使用。他们每月召开一次经济例会，进行两次检查，吸收村党支部、村委会全体成员、各厂厂长参加。这项措施，有效地保证了东泊子村企业在加强宏观领导下正常发展。

第二招：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近几年来，东泊子村克服“分净吃光”的现得利思想，在保证人们收入逐年

增长的情况下，制定了上封顶、下保底的政策，即，企业收入再好，职工分配额也不得超过3500元，留下较多的资金，搞扩大再生产和以丰补欠；企业效益较差，职工分配额也不得少于2000元，从而较好地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几年来，他们由于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所以累计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达400多万元，使企业后劲大大增强。

第三招：重视人才的培养。实践使东泊子实业联合总公司的“一班人”认识到：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的今天，企业要站住脚，必须靠科技，靠人才。为此，他们先后派32名技术骨干到烟台、青岛等地学习，还聘请了一名退休工程师任常年技术顾问。同时还充分发挥本村经济夜校的作用，聘请县、镇企业管理方面的人才，利用晚上的时间，举办培训班，讲授企业管理、经营决策、财会等知识，先后有400多人参加了培训，较快地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集体经济的壮大，使东泊子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其一，农业服务出现新变化。他们坚持以工补农的原则，几年来，先后投资50多万元，作为贴农资金，支援农民耕地、浇水、运输、脱粒等，方便了群众，减轻了农民负担。前不久，他们又成立了“农业公司”搞专业化、机械化生产，以发挥集约经营的优势。

其二，公益事业大发展。这几年，东泊子村先后投资兴建了“十配套幼儿园、六配套校舍”为孩子们提供了舒心的学习环境。建起了“百货商场”为村民购物提供极大的方便。投资30万元，安装了自来水，全村实现了自来水化。对

电费、土地税、各项集资等也由集体负担。每年可减轻农民负担26万元，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其三，经济腾飞的后劲足。仅1991年，该村就投资100万元，扩建了100亩虾池，新上了200亩扇贝、海带养殖；并投资350万元，新建了一座200万吨的冷藏厂。他们计划在“八五”末达到“亿元村”。

其四，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大提高。现在，东泊子村已开辟了宽阔的环村公路，整齐的街道两旁栽上了花草，新式居民房鳞次栉比，彩电、收录机遍及全村，300户村民家里已安装了电话。村里无贫困户，没有光棍汉，没有闹离婚的，没有赌博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的。村里党风正，村风好，环境美，连年被县、镇评为先进党支部、文明村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

大潮回落后的反思

1989年初春，几百万农民流入城市找活干，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继而，各地方政府、民政、公安机关及报纸、电台进行了各方面的宣传、疏导，动员其回乡，各地农村也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措施，才使持续了二、三个月的农民流动浪潮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下来。

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几次“下乡”运动，但农民浪潮冲击城市还是第一次。事情过去三年了，今天冷静地思考一下，那次被斥之为“盲流”的“民工潮”是一次偶发事件，还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事件？

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绝大多数农民宁愿饿着肚子晒太阳，也不愿意离开故土。在他们眼中“闯关东”“走西口”是万不得已的逃生之路，充满了难言的辛酸与血泪，唯有故乡的土地才是生存的根。一向安土迁的农民，何以一下子形成一股冲击城市大门的浪潮？它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一是农民商品经济意识的觉醒。十年改革，农村商品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不再为温饱发愁，商品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农民观念的更新，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引导农民向致富之路迈进。80年代，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主动的、以赚钱求富为目标的大规模农民流动，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二是人口与资源日益尖锐的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对人口的增长不作任何积极的干预和控制，任其盲目增长，人口迅猛增加，终于陷入了今天人满为患的困境。从1949年到1989年我国总人口由54617万增加到111191万，农村人口由48402万人增加到87831万人。社会劳动人数由1952年的20729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55329万人，农村劳动者由18243万人增加到40939万人。在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迅速增长的同时，耕地面积却从1957年的16.7亿亩减为1989年的14.3亿亩，净减少2.4亿亩^①，平均每年减少750万亩。人口与耕地数量的反向运动，使人均和劳均耕地面积大大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1957年，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3.05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8.12亩，到1989年，每个农村人口人均耕地1.62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3.5亩。人地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排挤出来。三是不协调的城乡关系。人口与就业的矛盾是我国人口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在安排城镇待业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是有成效的。而农村，尽管集中了我国人口的80%，是剩余劳动力最密集的地方，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被当作劳动力的“蓄水池”。户籍制度的建立，剥夺了农民进城就业的权利，把4亿多劳动力强行束缚在日益减少的耕地上。不仅如此，当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时，政府不止一次地

注：①以上数字均见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

向农村转嫁失业人口，如在六十年代，2000万农村籍的工人被遣返回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6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用牺牲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换取失业隐蔽化，农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剩余劳动力的“缓冲带”。就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既大量从农业中抽取资本，又大量吸收农村人口参与工业化。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在我国，由于人为地强化二元社会结构，只从农业中抽取大量积累资金而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52—1986年，农业为国家上缴税收1044.38亿元，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抽走5823.74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对农村的社会救济，农业平均每年要把新创造价值的12.4%无偿地贡献给工业。^①到80年代初，我国的工农业产值份额由50年代的3:7变为7:3，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城镇人口比重一直稳定在17—19%之间，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之比重一直在76%以上。8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按《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198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51.7%，这一数字明显偏高。因为，1983年时城镇人口比重还仅为23.5%（包括城镇中的农业人口），1984年以来，由于放宽了建制镇标准和推行市管县体制，把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在统计上算入了城镇系列，如山东省莱阳市在行政区划统计资料中，被列入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实际上城镇居民仅10万人，其余全是农村人口。如果把这部分“水分”

注：①《经济研究》1989年第12期

剔除掉，现在我国的城镇人口只占25%左右。1989年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仍达74%。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演变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化，成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这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中是极为罕见的。这种深层断裂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初期选择的战略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高，劳动容量小，形成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乡分离的封闭式城市工业化政策，用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产业转移，这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壁垒。制度性壁垒比技术性壁垒对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变革的阻碍作用要大得多，城乡隔离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演变滞后大大延缓了我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也给今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增加了难度。

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农民被严格地限制在耕地上，想动也动不了。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商品经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本来紧张的人地矛盾进一步突出出来；改革也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包括合理使用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城乡隔离政策的产物应运而生，乘势而发。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劳动力9500万人之多。但到八十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形下，急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自发地形成了冲击城市大门的浪潮。那次浪潮虽然用行政手段驱退了，但如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战略上没有新的选择，没有合理的转移机制，那

么，农民流动浪潮势必第二次、第三次出现！对这一点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定必要的对策，那就会在“山雨”到来时手足无措。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1.6亿人，到本世纪末，将突破2亿。为了生存，任何适龄劳动人口都要追逐生产资料并与之结合，以实现生产过程，这是社会存在的一般性根据之所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有了自主权的劳动者通过流动以实现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谋取生存手段的自然历史过程。可以预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流动寻职以摆脱失业地位，是农村劳动人口运动的常态。1989年初春的百万民工流动，只是个开端，它仅仅是未来亿万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曲。为了迎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必须从跨世纪的角度，把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中，科学地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

就地转移模式评价

改革十年，农村巨变。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亿万农民焕发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乡镇企业以不可阻挡之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888万个（1989年减少了20万个），乡镇企业的总产值达6495.66亿元，第二、三产业产值为6380.39亿元，占98.2%，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4%上升到53.2%，从业人员达9545万人，其中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达9295万人，占